

第一部分

预备解读旧约叙事文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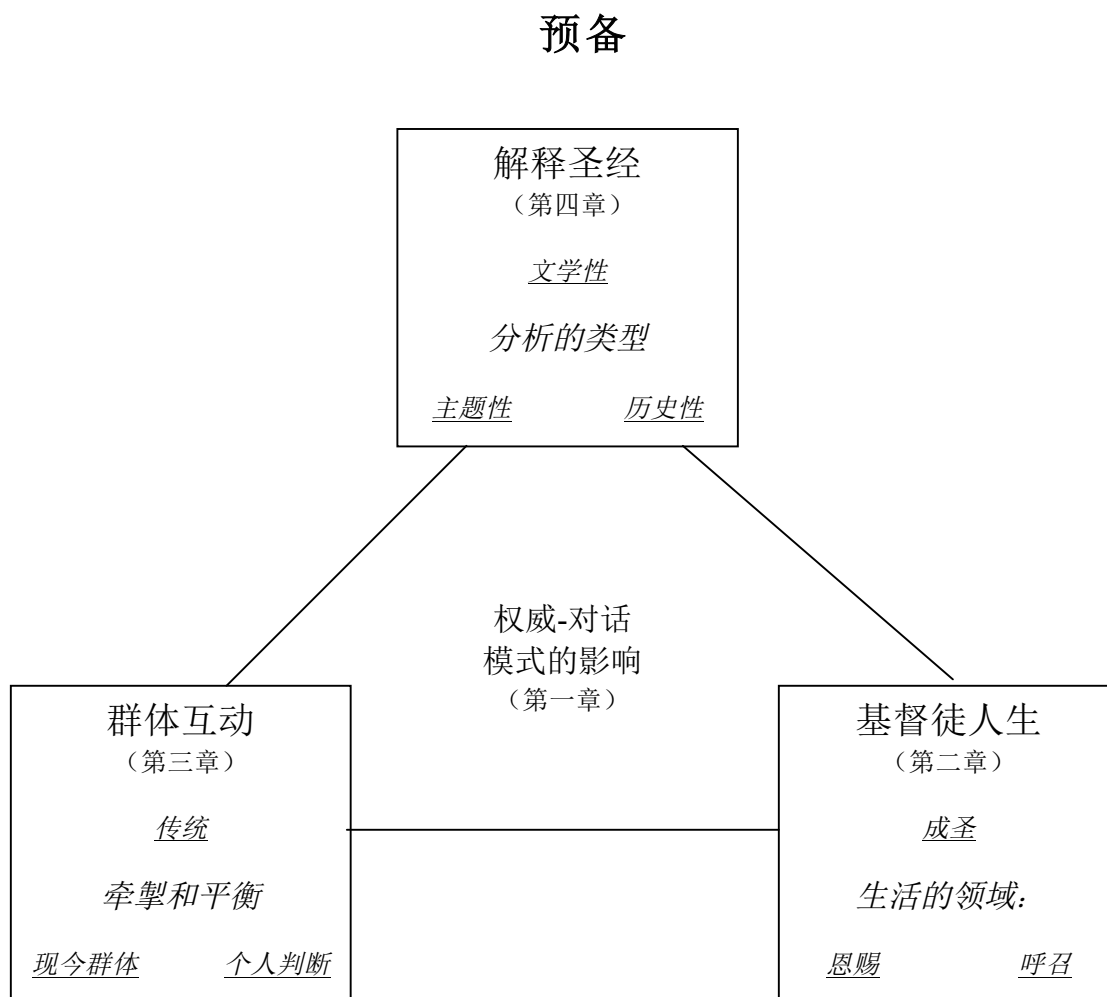


图2 第一部分的大纲：预备

概述

在本书的第一部分，我们将考察释经第一个步骤，即预备考察旧约叙事中的一些细节（见图2）。圣灵赐给我们诠释的能力，然而他却是通过各种方式来让我们拥有这种能力的。在以下几章中，我们将探讨圣灵预备我们诠释经文的一些重要途径。

在第一章中，我们将看到释经的预备涉及到我们应更加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释经中所采取的预设。理解旧约叙事总会带来我们的使命认同、信念与经历，同经文权威性表述之间的互动。我们是带着个人预设来研读圣经的，同时我们也抱着虚心聆听的态度。我们将这种个体与经文之间的互动称为权威-对话模式。

第二章会探论基督徒个人人生对权威-对话模式的影响。我们的成圣，恩赐与所领受的呼召，都将影响我们对旧约叙事的理解。圣灵在我们人生的这些领域的作为，正是为了更好地帮助我们具备应有的能力，来理解圣经。

第三章将探讨基督徒群体互动的相关影响。释经的预备，也包括了到向他人学习。在基督徒群体中，圣灵赐予我们一种制衡机制。我们是在自己所属的信仰传统，身边的新徒群体与个人判断的互动中，来尝试诠释旧约叙事的。

第四章探讨了对权威-对话模式的第三大影响因素：我们的释经。我们会看到圣灵从三个基本视角，引导上帝的子民来理解旧约叙事。我们会在旧约叙事中寻求那些自己感兴趣的主体；探讨叙事背后的历史事件；从文学作品的角度来领受这些经文。当我们对这些视角的功用与局限有更为深刻的认识后，我们就能把它们运用在旧约叙事研读中。

本书的这一部分为信徒之后释经提供了预备与基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一部分所探讨的问题为之后旧约叙事的研读和应用，提供不可或缺的信息。

第一章

预备的导向

我没想到他会叫我发言！毕竟他才是教授，而我只是学生。“你是说你并没准备好讨论的题目？”教授问道，我难为情地点了点头。“在这里学生们都要事先预备课堂讨论的内容。你总不至于期望我替你来说吧？明天由你来讲。”

坦白地说，我的确期望这位教授来讲。我喜欢靠在椅子上，坐在下面记笔记。课堂本不应当是教授的独白，而非师生的对话吗？然而当时的我真地遇上麻烦了，第二天我得讲一整堂课！

如果是你去上课，明白该由谁讲话非常重要，这样就知道自己应当作何预备。如果是教授讲课，那你去听就好了；如果是需要你讲，你就要做好相关准备；如果是师生对话，那你最好准备好既讲又听。

在我们预备解释圣经时，会遇到与之类似的问题。阅读旧约的叙事是否就像学生作课堂报告，一直都由我们来讲？或是好像听课教授讲课，我们只是去聆听经文所讲述的？还是更像课堂讨论，最终我们和经文都对最终形成的结论有所贡献？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影响着我们为理解旧约叙事所作的预备。

近年来关于释经预备的这三种观点分别都被人们所采用。有些释经者强调读者的贡献，有些释经者则强调经文的重要性，还有其他的释经者同时强调读者和经文，以寻求某种平衡。我们将这些观点分别称为主观模式、客观模式和权威一对话模式（见图3）。

读者-文本 主观主义模式 客观主义模式 权威一对话模式

图3 释经预备的不同导向

主观主义模式

“美只存在于那些欣赏者的眼中。”或许如此吧，一个人看为美的，在另一个人看来可能其貌不扬，甚至庸俗丑陋。有一种释经模式，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也与这句谚语很类似，“意义只存在于那些观察者的眼中。”这种模式所秉承的观点认为释经者对旧约叙事的理解是非常主观的，因此旧约叙事的含义是由释经者的个人观点和生活经历所决定的。

这种倾向在非正式场合中很常见。记得有一次我参加过一个查经班，带领查经的人读完一段经文后提问说，“你认为这段经文有着怎样的含义？”起先大家对经文的观察还颇顺理成章，但随着查经深入下去，你会发现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对经文含义的理解。带领查经的人为了结束争论的局面，叹了一口气，总结道，“到目前为止，我想大家都清楚地看到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释经方式。”这就是那次查经的结论。

基督徒读旧约叙事时，常常把这些叙事看成是随时可以盛装个人解读的空盒子，他们所要做的就是把自己的神学观点放进去。面对同一个段经文的各种不同的释经观点时，很多信徒只有耸耸肩承认这些经文的含义可以任由我们的看法所改变。

甚至正式的释经学也会沦为主观主义的俘虏。严肃的学者指出经文为解释设定了一些界限。即使如此，许多释经法认为经文的含义主要取决于读者的因素，而非取决于经文的客观权威性。在某种程度上，释经被看成是一种按照个人主观的理解来进行阅读过程。

哲学背景

圣经释经的观模式的哲学背景相当复杂，它的许多层面可以上溯到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休谟（David Hume, 1711-1776）挑战了启蒙运动的基本前提，后者认为人类能够通过理性而发现世界的客观知识，对于外在世界是与人类思考的理性结构相对应的观点，休谟表示怀疑。康德反对休谟这种过于偏激的怀疑主义，然而他也没有漠视休谟和其他人在外在世界与我们的概念化思想的内在世界之间，打入的那个楔子。总体而言，康德认定知识总是与对这个世界的概念化思考相联系的，而后者所依循的是人类思想对于经验所运用的分类。我们通过思想的网格来看待世界，我们的思想按照对事物一定的分类而发挥作用，由此我们才对世界产生了认识。

如此看来，知识本身并不是对客观现实的简单感知。我们不可能认识某个事物的本质，知识总是和外在现实与我们内在思想的交流联系在一起。

康德的观点中至少包含一些真理的成分，可以被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许多经验所证实的。例如，当你读到本书的这一页时，你看到了什么？是从纸面上进入你视网膜的杆状和锥状细胞的光子，以及由这些细胞所发出的由光学神经传递到大脑的电信号（按照康德的观点中，这种表述也是一个概念化的过程）？当然不是！你看见是文字和语句，除以以外，你也许还能对我此刻写作的思路有所明了。作为本书的读者，你自己所掌握的某些语言学规则来对这些你所看到的文字进行类别化的知识提取。你对这一页的理解与学前儿童或成年文盲的理解大不相同。因他们有着不同的思维类别，所以他们对这一页所形成的知识也就不同。

教育、文化、心理特质和无数的其他因素都影响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因此知识不可避免地含有一定的主观性。

这些认识论的观点极大地影响了对语言和文字的解释。在康德的基础上，经由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 1768-1834），狄尔泰（Dilthey, 1833-1911）和胡塞尔（Husserl, 1859-1938）等人的发展，近代释经的哲学已经开始强调读者前设概念（preconception）在释经过程中的重要性。

上个世纪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将读者的前设影响提到了诠释活动的显著位置。在他的早期作品《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认为在生活之网中我们前有的经验极深地影响了我们对生活的解释。他提出“任何时候，当一事物被解释为某个事物时，这些解释本质上是基于以前的所有，以前的所见，以及以前的概念。对于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某件事物，对其诠释永远不可能离开前设的概念。”

或许这一派释经哲学中最有影响的人物是伽达默尔（Hans Georg Gadamer），他赞同海德格尔的很多观点，也强调读者参与的重要性。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他否定了启蒙运动对理性客观性寻求的作法，认为那不过是“以偏见对抗偏见。”在他看来，启蒙运动去除前设概念的尝试，实际上是要以一种连自身也不甚清楚的理性主义前设来取而代之。他认为释经中的前设概念不仅是不可避免的，更是我们理解的基础。

这种释经学观点的影响已经反映在方方面面。比如，作为一个新兴的文学评论学派——“读者反应批判”学派，已将注意力转向读者，他们将读者作为释经的主要因素。按他们的观点，经文的意义更多地存在于读者的理解过程之中，而非存在于古代作者和文本（这是语法—历史方法所强调的）之中。

主观主义模式的极端形式

在肯定释经主观因素的同时，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也要求人们警惕随心所欲的解释。尽管诠释活动依赖于人的前设，但读者不应随意地把自己的意思强加在文学作品之上。伽达默尔严正地警告说，“所有正确的诠释必须小心地防范各种人的异想天开，以及那些无从感知的思维习惯所带来的局限，而应把眼光转向‘事物本身（在文学评论中，它指向具有含义的文本）’。”

可悲的是，许多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跟随者过分强调前设概念重要性，由此导致了圣经诠释中日益增长的极端主观模式。

近期的若干神学运动有意识地以主观模式解读旧约叙事，他们均先入为主地认为这些经文的客观含义即使曾经是存在的，然而今天已无法获知。他们不但没有让自己服在经文之下，相反却大胆地以自己的理念来构筑经文的含义。

一些鼓吹解放神学的人公开宣称他们所强调的是诠释的主观层面。有时他们也试图将自己的观点建立在较客观的方法上，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非常依赖自己的前设概念，以此来形成他们的方法和结论。例如，克罗阿托（Croatto）竟公开地表示他对主观性的赞同，“解经就是将自己的意思与经文附会在一起，如果有人说自己只是在解经，那他不过是有意或无意地在掩盖自己真实的动机。”克罗阿托并不否认历史评判分析的重要性。他也尝试着将诠释指向客观的经文，但在他看来这一切要建立在在对圣经可能具备的多重含义的意识上，而要找出这种‘含义的剩余’需要通过我们向圣经文本提出新的问题。

解放神学的拥护者有意挑选某些经文作为规范性经文，并按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来建构它们的含义。于是关于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叙事失去了原意，而成为一场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阶级斗争；约书亚记中征服迦南地的描述被解释成无产阶级革命。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多人会指责解放主义神学家将圣经变成他们意识形态宣传工具的作法。

与之类似，许多赞同妇女解放主义和同性恋解放主义神学家也以诠释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主观性为由，为他们的释经结论作辩护。他们按照解放主义的经典思路，提出一段经文来扭曲另一段经文的含义。比如，伊丽莎白·菲奥伦萨（Elizabeth Fiorenza）所说的“只有离开性别歧视以及男性中心主义的圣经传统……释经才具有启示的神学权威。”

当人们先入为主地采用以这些方式进行释经讨论时，各种极端的主观主义将会随之而来，因此，此时的解经已成为一种表达个人观念的手段，而非阐明文本的尝试。

偏重描述（descriptive emphasis）

这些观念将会对释经学造成怎样的影响？主观主义带来了怎样的改变？简而言之，如果我们在释经中采用了主观模式，我们就不大需要将注意力集中在释经的正确规则上，因为我们的理解主要

依赖于那些我们带入经文中的预设观点。因此采用主观模式的人更多地侧重于描述人们在读经时思想中所发生的变化，而非指导人们应如何读经。他们更多关注是个人的参与，以及宗教、哲学观念和文化传统对释经的影响。

几年前有一次我跟一群美国人和欧洲人一起打橄榄球。虽然我们在一起比赛，很快就发现欧洲人和美国人对橄榄球规则的理解完全不同。那天下午我们的最大问题就是该按谁的规则来打比赛，双方都想把自己的规则强加于对方，但又无法说服对方自己的规则是最好的。可见让他们认定存在着一套正确的橄榄球规则几乎是不可能的。

许多倾向于主观主义的释经者也用与之类似的观点来看待释经的规则。对他们来说，解经方法基本上是约定俗成，一些人习惯于某种规则，而另一些人则习惯于另一种规则。西方人用一种方式解释，东方人则用另一种方式解释；社会中的强势人群按一套规则解释，而受压迫的人群则用另一套规则来解释；男性以特定的角度读经，而女性读经的角度又大相径庭。因此我们无法判断到底哪一种解经方式才是最好的。

例如，伽达默尔坚持认为他的释经学思路并不是一种新方法。他怀疑解释的规则只不过是一种获得独立、抽象的客观知识的尝试，而这个目标最终是不可能达到的。因此他集中精力描述诠释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可以说伽达默尔对反对方法的辩护本身就是一种方法，但我们不应忽视他最根本的目的，即描述我们阅读时思想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解放主义神学的倡导者在谈到实践（*praxis*）的重要性，或反对压迫的斗争时，常常会接近于依循某种释经学的方法论，在他们的讨论中，也会时不时地出现关于释经学原则的讨论。尽管如此，这些原则性的讨论常常是不分对错的，解放神学主要让我们看到的是对于那些相信某种意识形态的人，圣经是如何被解读的。

虽然大多数的福音派基督徒在释经时会拒绝极端的主观主义，我们仍然要注意不要将那些主观主义所带来的助益也一同抛弃。对于释经的主观模式，也许最为重要的在于它向我们指出了我们预设的概念总会对我们关于旧约叙事的诠释产生影响。只有意识到这些影响，我们才能对其加以批判，并因此能够从不同角度来读经。

然而，我们不应仅仅满足于看到在释经的过程中，我们的思想发生了怎样的改变，还要从中认识到我们应该如何解释圣经。根据这种在释经预备中对指导性原则的需要，我们要来讨论第二种重要的释经学模式。

客观主义模式

“让事实说话。”这句话强调我们要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来做判断，而不是根据主观的臆断。正如弗雷迪（编者按：弗雷迪探长是上世纪50年代由杰克·韦伯所导演的电影《天罗地网》中的人物）的口头禅，“我只要事实，女士。我只要事实。”

几百年来，在与之类似对客观性渴望的推动下，产生了一种特点鲜明的圣经释经模式。这种释经学模式的口号就是“让圣经说话”，它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对经文的主观感受转移到了对经文的客观性知识上。

在非正式的释经中客观主义模式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一般来说信徒都会认为他们对圣经的诠释只是在陈述明显的事实。在关于经文含义的争论中，我们会强调说“你只要客观地读这段经文，你就会同意我所说的。”

在正式的释经学中，客观主义倾向于依循严谨的实证科学方法论来分析圣经。在英语世界中独立的观察、提出假设、验证假设构成了学术界的释经基础，释经者以科学的精确性和中立的客观性来尝试确立并表达释经学的结论。

客观主义的释经模式以不同的方式将释经看成是一种剥离各种预设概念并审慎使用释经技巧的过程，以此来让圣经按照自己的意思向我们说话。这种释经学模式的目标就是寻求一种方式，从而让经文的含义传达给那些不存偏见，渴慕领受的释经者。

哲学背景

以上这种释经学模式在哲学上经历了复杂的发展过程。最近R.伦丁（R. Lundin）指出这种模式与笛卡尔（Rene Descartes, 1596-1650），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和托马斯·里德（Thomas Reid, 1710-1796）的哲学观点之间存在着关联。

笛卡尔试图排除所有个人持守的信念，把知识建立在一个自证、客观的认识论基础上，以此来进行他对人类知识的探求。他热切地期望将知识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这种思想成为了启蒙运动的奠基石。在他看来当人类排除一切的偏见来追求客观理性的确定性时，他就可以获得关于自身和世界的真正知识。

培根的科学程序理论也影响了释经学的客观主义模式。培根认为科学方法涉及三个“探索步骤”，（1）收集所有具备类似特征的现象的例子，（2）观察那些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进行对比

的现象，（3）比较这些观察到的结果。通过这种科学步骤，观察者可以通过研究各种事实材料，从而避免了个人偏见对结论的影响。

启蒙运动以后，客观主义倾向伴随着里德的常识现实主义的发展而被英美世界普遍接受。苏格兰常识现实主义者持守这样一个的信念：人类观察者是能够获得关于世界的客观知识的。正如伦丁评论所说，“作为一种认识论理论，常识现实主义...宣称人的思想不需要外在的权威而能够确切地知道一些事情……简而言之，所有态度认真、思维正常的人都可以认识那些掌管物质和精神世界的基本法则。”

像康德一样，里德意识到我们是通过概念化的观念网格来认识世界的，同时他认为上帝以一种与客观世界对应的方式创造了我们的思想。当我们专注地运用我们的感官和理性能力时，我们便能认知真实的世界。对里德来说，对这些先决条件哲学上的质疑，无疑是在否认最基本也是最普遍的常识原则。

我们大多数人都能认同这些哲学传统中有一些真理的成分。通常我们相信我们的感官可以让我们获得可靠的知识，并相信我们的理性推断能力可以帮助我们面对每天的生活。大致而言，我们都认为自己对于真实、客观的世界有所经验、认识的。

英语世界的大多数释经者都将这种思考方式带入到释经学中，按理性科学的客观性来建立他们的释经框架。他们认为如果我们去除了那些错误的理解，将科学程序应用到释经当中，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圣经原本的含义。无论神学上的保守派或自由派，释经者都相信可以通过适当的方法揭示经文的客观含义。

福音派的释经学尤其受释经客观模式的影响。在早期的释经学著作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一脉相承的客观主义，给人的感觉是它是一种天经地义的模式。文法—历史的释经进路就是以客观知识为导向的，它带动了一种被称为“‘白板’（*tabula rasa*）式的解经模式。”

今天这种倾向仍然存在。近年来对前设概念对释经影响的研究让人们的主观因素更为敏感。今天任何一个负责任的释经者都不会认为人能消除所有的主观因素。然而很多时候福音派基督徒对这种主观因素的重要性却表现得熟视无睹，很大程度上他们只是在强调经文含义的客观性。

偏重规范（prescriptive emphasis）

客观模式所导致的释经偏差是显而易见的。主观模式侧重于描述读经时我们的所思所想，而客观模式则会侧重于规范我们读经的方式。

浏览一下福音派的释经学著作，我们就可以看出对这种对释经规范的偏重。以两本书的书名为例：《圣经解释的规则》（伯克富）和《圣经释经学的科学》（查弗Chafer）。偶尔有人会提醒说不要将释经变成一门科学，但总地说来，福音派释经学的核心一直是在关注释经的规范和原则，以此来保证我们正确地认识经文。

在预备诠释旧约叙事时，认识释经的规范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些好的方法原则可以让许多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得到纠正。但是如果过于侧重释经规范，而不仔细考查诠释的实际过程也会让人误入歧途。

例如，人们常会注意到这样一个释经学原则：以圣经中的诫命和教义性经文为准则来诠释旧约叙事。无疑这个原则可以帮助我们通过参照其他经文来理解某段经文，然而这只是释经一个方面。如果我们仔细审视这种对叙事的诠释方式，就会发现我们过于偏重教导性的内容。实际上，叙事性的内容本身也能帮助我们反过来更深地理解圣经教导性的内容。比如耶稣就用大卫的经历来理解当如何守安息日（可2:23-27）。与之类似我们也可以通过那些关于偷窃、通奸、谋杀和作假见证的叙事来认识这些罪。总之，圣经叙事性和教导性的内容可以互为参照，任何否认这种互动性释经学原则的观点都是脱离实际且具误导性的。

因此，只要不脱离细致的描述，释经的规范性预备就是有价值的。我们必须在实际做了什么的基础上来讨论应该做什么。

权威—对话模式

在本书中，我们将采用权威—对话的释经模式以避免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模式的陷阱。这种模式将帮助我们不致滑向相对主义和理性主义的释经中。

有些学者采用了对话的释经模式。具有主观主义倾向的海德格儿和伽达默尔推广了这种对话模式的释经进路。他们将读者和文本的关系描述为一种对话双方彼此给予和接受的互动。尽管这种模式在很多方面都对释经极有助益，然而它在福音派信徒中却没有被广泛采用。如果我们将释经的过程看作是一种对话，我们一定要注重那些有关圣经权威性的教义。

与权威的对话

在日常生活中与我们谈话的对象包括：在我们权威之下的人，对我们有权威的人，以及和我们平等的人。根据这种关系的不同，不同的谈话也会具备不同的特征。我们对于谈话对象的看法极大

地影响着对话的过程。比如当讨论的主题是关于医药时，我们与学龄前儿童的谈话和与医生的谈话相比，在口气和所谈的内容上都会大不一样。如果讨论的主题是关于法律，我们与朋友的谈话和与律师的谈话相比，也会有极大的差异。

因为受历史上改教运动的影响，福音派信徒普遍认为圣经在我们信仰和生活的一切事上有着不容置疑的权威。这个信念极深地影响着我们与旧约叙事的对话。

在所有与权威的对话中，至少包含两个共同因素：一方面我们带着自己的问题，满怀希望，预备与对方展开一个有意义的对话，另一方面我们渴望对方能让我们看到那些我们原本所不知道的。

有一次我在密西西比州一个偏远小镇开车时，因为错过了一个路口而迷了路。当我经过一个加油站时我想里面的人一定知道路该怎么走。于是我开车进入加油站，向服务人员问路道，“您能不能告诉我到鸭子山（Duck Hill）怎么走？”然而服务员的指点并没有打消我的疑问，我回应道“我不确定自己是否理解对了，我该开多远，在哪转弯？”最后服务员不得不给我画了一张草图告诉我该怎么走。

当我开进加油站时我对自己所处的环境以及加油站的服务员都有很多先入为主的假定：我错过了一个路口，加油站的人说的是英语并愿意给我指路，并且一定有一条路通向我要去的地方。然而即使我在开始交谈之前已经有了这些观念，我仍需要更多的信息。服务员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事，如果我想找到路，我要弄明白他向我说的话。于是我认真地听他说，观察他的手势，思考他画的图，甚至重复他的话，以确保我真地明白了他的话。

与之类似，我们与旧约叙事展开对话时，也怀着各种各样的期望和预设。例如我们相信旧约叙事在某种程度上是能够被我们所理解的，并且它会向我们传递许多有价值的信息。以我们从前的经验，我们甚至还能对经文要向我们传递怎样的观念有一些猜测。如果离开了这些预设，我们便无法和圣经展开一个富有成效的对话，释经的活动也将因此无从开展。

然而与此同时旧约叙事本身仍有着不容置疑的权威。我们不应将自己的观念读入经文，而是应该听经文要向我们讲什么。我们热切地期望知道旧约叙事能够带给我们怎样的帮助，这些叙事为我们提供了无误、无谬的原则，因此我们要使用各种的技巧来认识经文向我们说了什么。

在许多方面，只有权威一对话模式能让我们不以一种等量齐观的方式将自己的权威与圣经并列起来。主观模式很容易将圣经降到一个比我们低的层次，于是我们按照圣经评价我们的方式来评价圣经。客观模式倾向于将我们对圣经的理解提高到圣经本身的高度，于是我们对圣经的解释就被视为等同于圣经的教导。与这两者相比，只有权威一对话模式强调了圣经至高无上的地位，并反映出圣经的读者只是圣经文本的仆人。

权威一对话模式与主观模式或客观模式都不相同。与客观模式相比，它承认读者的前设概念对释经有着持续的影响，释经本质上是一种对话，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向圣经提出问题并有一系列的基本预设；与主观模式相比，权威一对话模式强调那些让我们认同旧约叙事权威性的释经方法的重要性。释经是一种对话，它更是一种与绝对权威的对话。图4让我们看到了这种方式的特别之处。

旧约故事 权威性的陈述 读者 预设

图4 权威一对话模式中的优先次序

客观主义模式的危险

客观模式释经的目标“按旧约叙事的原貌来理解它们”，听起来很吸引人。无疑我们应该克服各种障碍以期达到对圣经正确的理解，但即使如此，客观主义模式使徒消除我们前设概念作法的背后，仍然潜伏着严重的问题。

一次我走访了一个跨宗派的查经团契，负责带领团契的年轻人公开宣称圣经是他们信仰唯一的告白，基督是他们唯一的信经。他以从不参考任何圣经注释书为夸口。“我得到的信息都是直接来自圣经的”他信誓旦旦地说。他对自己的客观性极有信心，并向我们解释关于某段经文的真义。按照他的观点，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听圣经说什么。

然而，在临近查经结束的时候，一个来自其他教会的年轻女士插话道，“你不是在教导圣经，而是在教导你们宗派的观点！”她接着告诉大家这段经文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当他们彼此争来争去时，很显然两人都不客观，他们都在按各自宗派的神学来理解这段经文。

每个基督徒在读经时都会受到个人前设概念的影响。想想你最喜欢的某段经文，你已读过甚至背过这节经文多少遍，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每当我们读到它时，很有可能还会发现新的亮光。更令人惊喜的是，几年之后当我们再读到这段经文时，我们甚至能从中发现更多的亮光。到底什么因素改变了我们对经文的理解呢？经文本身并没有改变，并且通常我们解经的技巧也不会有显著的改变。可见我们本身才是引发我们对经文产生不同理解的因素。在上帝智慧的护理下，我们的生命在他完全掌管之中，他引导我们对经文的体验、提问和预设发生改变，从而使我们对一些甚至是很熟悉经文的理解也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这些经历使我们相信我们对旧约叙事的解释将会一直受预设概念的影响。然而令人感到悲哀的是，倾向于客观模式释经的福音派基督徒常会有一个错误的理解，他们认为自己可以按照圣经的意思来理解它，他们模糊了圣经与他们对圣经的解释之间的差别。

这个问题在学术界也经常会出现。相比于一般的基督徒，释经学者们通常承认不可能存在完全的客观性。但实际上，他们却常常忽视自己的预设概念对释经所产生的影响。在释经过程中，他们会对一些明显的释经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但在一些对自己观点的初步考察之后，他们也表现得好像自己的预设概念并不重要一样。这些学者以为他们的读者也会不偏不倚地认同他们所设计好的那些释经进路，其结果是他们常把自己的释经结论看成是一种对事实的客观陈述。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取向常会导致某种隐藏的主观主义，那些不为我们所察觉的偏见实际操纵了我们对经文的诠释，我们在无意识间将自己的想法读入经文之中。只要那些不断变化的预设概念隐藏在我们的潜意识中，它们就会带来误导的危险，我们对经文的解释也就不可避免地受我们个人观点的影响。

近期的哲学释经学已影响到了更多的福音派基督徒，人们因此开始质疑客观模式，那种认为读者可以通过严谨的方法去除所有个人偏见渗透的想法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挑战。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会看到福音派释经学会愈加越远离客观主义的释经模式。

主观主义模式的危险

权威对话模式的释经也不同于主观主义模式的释经，两者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对释经方法的评价。

我们看到强调释经学主观性的释经者不愿对释经设定规范，他们对历史传统中那些对规范的重视心存疑虑，在他们的印象中这意味着要除去一切对圣经的个人化解读。然而权威对话模式对设定规范的看法却截然不同，虽然解经方法不可能不受读经者背景的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去解释旧约叙事。事实上因为这些经文是我们的权威，我们才需要尝试一切释经的方法来让经文向我们传递它的信息。

我们再一次看到圣经权威性成为了焦点问题。在主观主义盛行的圈子里，圣经与信徒被视为是平等的。因此没有什么理由能说服我们应该让释经的方法从属在圣经的权威性之下，因此释经者完全可以让旧约叙事成为他们个人随意发挥的工具。

与之相比，福音派信徒却相信信徒应顺服在旧约叙事的权威之下，承认信徒有责任按经文的正意来诠释圣经。因此，我们会看到有些解经方法确实比另一些更好。事实上，某些解经方法

与旧约叙事是无法调和的。福音派释经学具有明确的“伦理”，我们不能让旧约叙事随我们弹奏的音乐翩翩起舞，与之相反，是我们应该按照旧约叙事的旋律而舞蹈。

我们应顺服在圣经的权威之下，而不是将关注点投入在某个理解圣经的特定角度，无论这种特定的角度是传统（伽达默尔），或某种生命的投入（海德格），或社会政治意识形态（解放神学）。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让自己的理解与旧约叙事本自身所呈现的相吻合。

那么，我们该如何决定用何种方法释经呢？许多方法应用起来并不是很困难，即使是对经文粗浅的理解也能给我们提供一些指引。比如没有人会否认旧约叙事的文学特质，如忽略这些特质就会损失很多圣经要向我们传递的信息；旧约叙事是按特定的语法写成的，释经者必须遵守这些语法的规定；这些经文是古代的文本，这需要将它们按照古代书籍来对待，如果将它们按照现代作品来阅读，就必然造成误解。关于这些诠释原则的基本要点我们还可以一直罗列下去，正如D.特雷西（Tracy）所说，“归根结底，每一个文本都有一个完整的结构，在文本中我们探讨的每一个主题都要求我们对文本形式和结构给予严肃的对待。”

然而除了这些基本考虑要素之外，很显然我们的解经方式就需要按照权威对话模式的框架来开展。我们从自身处境所决定的释经预设出发，并在与圣经的交流过程中不断地对释经方法作出调整。

在日常生活中，你怎样才是了解一个人最佳方式呢？我们从小与人交流的经验就让我们掌握许多了解他人的方法。开始交流时我们有许多自己的预设假定，但在谈话的过程中我们不断地调整我们的方式。对于那些我们要了解的对象，一些人说话爱使用强调的口吻，一些人爱使用手势，一些人甚至看起来有些语无伦次，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尽量让自己适应于每一种情况。我们会问问题，请他们再说一遍，并尽可能地调整我们的方式。在继续对话的过程中，我们会调整着自己的方式来与谈话对象所表现出的状态相适应。

与之类似，诠释旧约叙事的方法也随着我们与经文交流的深入程度而改变着。正如利科（Ricoeur）所指出的，当我们意识到方法论是认识过程的一部分时，我们就会看到方法论的指导原则对于解释来说是有益的。所有建立和改进释经学方法的尝试都是我们与旧约叙事持续对话的一部分。诠释的规则并不是客观不变的，相反，它们是随着我们对经文理解的增进而不断改进的。

与主观主义所倡导的相反，权威对话模式认为我们需要努力地改进释经的方法，借此来达成对经文正确合理的理解。因此当我们对旧约叙事愈加熟悉时，就应当更主动地改进我们的释经方法。

释经的进程

然而，威对话模式是否仍会让我们陷入另一个无效的循环中呢？当我们在与圣经对话的处境中改进方法，更新我们的结论时，有什么可以保证我们能够取得更深的突破和进展呢？

释经的过程常被描述成一个“释经学循环”，这意味着在读者和经文之间一直存在着一个彼此往复的循环。然而，正如许多人所认识到的，这个说法并不准确，容易对人产生误导。我倾向于认为这种释经是一种“释经学螺旋”。这样描述方式反映了读者与经文之间的对话关系，同时也表明这个对话是可以朝着对圣经更全面认识而不断推进。

是什么推进着这种更深入的理解呢？正如我们在引言中提到的，释经的过程最终是由圣灵所掌管的，只有圣灵的光照才能使我们更接近真理。近来的研究也指出，圣灵在我们释经的过程中会运用各种资源来帮助我们。

在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 1768-1834）之前，人们通常谈论专属于神学、文学或法学的释经学，不同专业的释经学都是各自特殊的解释方式。然而施莱尔马赫认为所有的语言都有一个共同适用的“理解艺术”。他认为在一切专业学科背后都有着普遍的人类理解过程。这种观点的影响之一就是将对圣经的诠释置于人类各种学科知识的大背景之下。

顺应这种时代潮流，福音派信徒应意识到对旧约的诠释会受到从自然科学到人文科学几乎所有学科的影响。例如其中较重要的学科如语言学、文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和考古学等，这些学科都能为我们更好地理解旧约发挥作用。

一些福音派信徒可能不可避免地会觉得依赖于圣经之外的资源进行释经有不妥之处。单纯地读圣经不是很好吗？依靠其他学科难道不会与“以经解经”的释经原则产生矛盾吗？

事实上，“以经解经”是与圣经无误诠释的概念相关的。改教时代的神学家坚持认为解释圣经唯一无可质疑的原则就是圣经本身，而非教会传统和个人判断。福音派的教会继续持守这个基本原则，即圣经是其自身最好的诠释来源，圣灵使用圣经来帮助我们解释圣经。然而这个原则并没有排除其他学科对于释经所能发挥的作用。

对圣经以外各种学科的依赖也表现出了特殊启示与普遍启示之间的互补关系，福音派信徒对于自己长久以来的所坚持的一种观点确信不疑，即上帝借着圣经（特殊启示）和所有被造之物（普遍启示）来显明他自己。这两种不同的启示是互补的，而非彼此矛盾的。

通常福音派信徒只是单向地思考特殊启示与普遍启示之间互补的关系，当我们审视生命的某个层面时，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认识相关的问题。在任何特定的问题上，圣经都是我们得到正确认识的原则和向导。历史上，新教信徒普遍强调圣经是我们能够正确理解普遍启示的唯一视角。

然而从另一个方向来看待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的互补关系也同样是成立的：普遍启示也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特殊启示，圣灵借圣经之外的资源来教导我们，帮助我们更好地诠释圣经。

伽利略（Galileo, 1564—1642）和教会权威之间的冲突向我们显明了圣经之外的资源对诠释圣经的重要性。教会认为约书亚记10:13（于是日头停留）指明太阳有一段时间停止了绕地球的旋转。在当时这种解释似乎是很合理的，然而今天的科学研究已表明日夜的周而复始是由于地球自转形成的，因此现在大多数的福音派信徒对这段经文的理解不同于前人。我们知道白昼神奇地为约书亚延长，同时我们也知道日头停止是约书亚在自己所在的位置看到的一种现象。现在我们看到约书亚10:13是用日常非科学性的语言写成的，就像我们用“日出”、“日落”所要表达的意思一样。对普遍启示更清楚的了解不会让我们拒绝圣经的权威，相反地，它会帮助我们调整对圣经的诠释。在诸如以上的例子中，圣灵都在使用普遍启示来增进我们对特殊启示的认识。

我们要记得我们理解这两种启示的能力受许多因素的限制，因此对圣经的研究似乎与其他学科之间常存在着冲突。当冲突发生时，这两种形式的启示并非是真地是彼此矛盾的。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都来自于上帝，它们实际上是不会矛盾的，之所以会出现问题是因为我们有限的认识能力造成的，有时我们对圣经的理解需要提升，有时我们对普遍启示的认识还不够，还有一些时候，我们对两者的理解都不正确。

当这类矛盾出现时，福音派信徒倾向于首先认为自己对圣经的理解是正确的，除非从普遍启示有极其明显的证据证明我们对特殊启示的理解不正确。这是一种明智的作法，但我们也不要走得太远，以至否认了从不同学科中所获取的见解的价值。普遍启示带给我们的那些强有力的证据，可以改变我们对圣经的理解，同时我们却不要因此放弃对圣经权威的顺服。巴刻(J. I. Packer)对此有很好的总结：

科学理论不应限定圣经可以说什么或不可以说什么，然而圣经之外的信息有时可能会暴露我们对圣经存在着错误的理解……尽管释经必须由经文本身来控制，而不是受外在因素影响，但一直以来释经的进程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却是来自各种对经文含义这样或那样的追问。

在接下来的三章中，我们将讨论圣灵如何使用圣经和普遍启示来影响我们对旧约叙事的理解。这些影响因素可以按许多方式分类，为简便起见，我们将它们分为三大类：*基督徒个人人生*，*群体中互动*，以及*解经*。

基督徒个人人生

首先我们会看到基督徒的个人人生影响我们对圣经的理解。圣灵使用我们的个性、经验和所从事的职业来帮助我们理解旧约的叙事。我们人生中那些不幸经历让我们能够对圣经关于人类痛苦的描述有更深入的理解；我们那些喜乐的经历又让我们看到旧约叙事的另一些层面；我们所秉承的伦理让我们更加确信圣经的原则并使之具体化。我们生命中每一个寻常或不寻常的方面都有可能帮助我们沿着释经的螺旋上升。圣灵使用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来影响他们对旧约叙事的理解。

群体中互动

其次我们看到圣灵借我们与他人的交流来预备我们明白圣经。通过这种普遍启示我们看到圣灵如何通过他人，包括教师、书籍、朋友和家人来帮助我们认识圣经的。与那些受教于圣灵的人交流使我们得以预备充分，从而可以更好地进行旧约叙事的研究。

解经

最后，圣灵在我们解经的过程来预备我们更好地诠释圣经。我们在读经中所得到的知识极深地影响着。没有任何事物能够取代直接阅读特殊启示对我们的重要性。圣经的察考帮助我们沿着释经学的螺旋上升，从而达到对圣经更好地理解。

如图5所示，这些释经资源都对我们的释经给予了不可或缺的帮助。

释经学螺旋：基督徒个人人生，群体中互动，解经

图5 释经过程的主要资源

结论

本章的开篇我们看到在课堂讨论之前我们需要预备好既讲也听。认识旧约叙事正如同课堂讨论，我们在讲出自己理解的同时也需要听圣经向我们所传递的。然而对于这样的对话，我们在预备时并非单单凭借个人的能力，圣灵通过基督徒的生命，他在群体中的交流，以及对圣经的察考来帮助我们预备得充分，因此我们可以沿着释经学螺旋上升的道路，对旧约叙事有更深入的理解和应用。

复习问题

1. 描述学术界释经学主观模式的哲学背景。为什么这种模式会侧重描述？主观主义释经模式有怎样的危险？
2. 描述学术界释经学客观模式的哲学背景。为什么这种模式会侧重规范？客观主义释经模式有怎样的危险？
3. 什么是旧约释经学的权威—对话模式？它与主观模式和客观模式有什么不同？这种模式将是如何给我们的释经带来改进的？

应用练习

1. 读历代志下12:1-12，写下从这段经文中你得出的五个神学结论。评估你的结论，你的预设概念对你关于这段经文的理解有怎样的影响？
2. 针对于历代志下12:1-12，研读、比较一本老的释经书和一本较新的释经书对其的解释。两种释经有什么不同？你能否看出释经者的预设对两种释经的影响？
3. 请你的一位朋友读历代之下 12:1-12 并写下他对这段经文的五点神学概括。用你对问题 1 中的答案来与他的结论作比较。两者有什么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